目錄

讀《魏源研究》| 徐復觀 | 021

再版前言 | 025

第一章 魏源的生平和著述 | 037
魏源大事年表 | 077

第二章 時世與學風 | 079
一、政治不良造成奴才 | 081
二、教育不良造成庸才 | 086
三、貪黷風氣敗壞政治與經濟 | 090
四、耕地不足與利權外溢 | 096
五、考證學的退潮 | 099
六、義理學的復興 | 105
七、今文經學的復興 | 113
八、經世之學的講求和擴大 | 116

第三章 魏源與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 | 121
一、清代今文經學的復興 | 122
二、魏源與清代今文經學 | 125
三、經學是經世之學 | 135
四、儒效論的發揚 | 151

第四章 魏源的詩經學 | 161
一、詩教與詩經學 | 162
二、詩樂關係 | 167
三、晚周與孔孟的用詩傳統 | 172
四、荀子引詩及其傳統 | 175
五、漢儒說詩的「諫書」傳統 | 185
六、今古文詩 | 187
七、魏源在清代詩經學的地位 | 200
八、〈默觚〉的用《詩》 | 204

第五章 魏源易老與變革復運之學 | 215

第六章 魏源論心性才性與治術 | 251

第七章 魏源與治河 | 285
一、清代的河患 | 286
二、人的因素 | 289
三、河患成因的總檢討 | 294
四、前代的經驗 | 299
五、近代的難題 | 304
六、應採的新道 | 309
七、治河仍須努力 | 313

第八章 魏源與漕運和八旗生計 | 319
一、清代以前的漕運 | 320
二、清朝的河運制度 | 321
三、道光的試行海運 | 327
四、魏源的方策 | 334
五、八旗生計和屯墾問題 | 341

第九章 魏源和鹽政改革 | 349
一、明朝的遺制 | 350
二、清代的綱法 | 352
三、猖獗的私鹽 | 357
四、票鹽的推行 | 361
五、成功的經驗 | 370

第十章 魏源與清代貨幣金融問題 | 375
一、銀貴錢賤的恐慌 | 377
二、鴉片是害命謀財的禍首 | 381

三、大錢與鈔幣 | 384
四、自鑄銀圓與開礦 | 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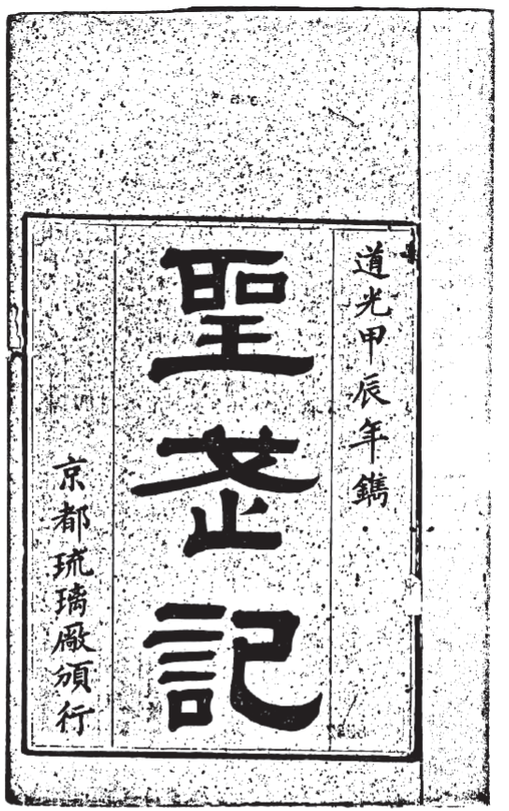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魏源的史地疆防之學 | 401
一、《聖武記》 | 403
二、《元史新編》 | 410
三、《海國圖志》：劃時代的撰作 | 416
四、《海國圖志》的編撰與取材 | 421
五、《海國圖志》的內容與主張 | 431
六、《海國圖志》的宗旨與評價 | 454

結論 | 469

附篇 魏源的朋僚師友 | 485

莊存與 嚴如煜 周系英
姚學瑛 蒜攸銛 歐陽輅
李兆洛 李宗瀚 楊 芳
周天爵 湯金釗 包世臣
劉逢祿 王鳳生 胡承珙
鄧顯鶴 陶 澍 湯貽汾
唐 鑑 馮登府 張維屏
周 濟 徐 松 張海珊
李克田 陳 沆 程恩澤
賀長齡 林則徐 姚 瑩
陳 鑾 陳 奐 龔自珍
陸建瀛 裕 謙 黃爵滋
陳起詩 何慶元 黃 冕
李星沅 陳起書 張際亮
何紹基 湯 鵬 汪士鐸
張 穆 鄒漢勛 姚 燮
陳 澧 金安清 何秋濤
董桂敷 曹 籀 蔣湘南
陸 獻 吳蘭修 其 他

參考及引用書目 | 584



魏源《聖武記》

滿清一代，極盛於乾隆；傳統的學術藝文，也以乾隆數十年間為一大集結。過後則政治、學術，都漸呈種種衰變之象。後來更因為西潮激蕩，二千多年來的種種傳統軌範，迅速解組，民族和文化，都進入有史以來最大的、自新適變、奮鬥求存的局面。中國由傳統進入現代、從禹域參加世界，其間面對時代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的樞紐人物之一，就是魏源。

魏源痛切地指出：當時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人才之虛患」。[1] 他說：「人才不競之謂貧」[2]，這個人才貧虛的大患，其實也和當時另一致命之傷：「人心之寐患」[3]，相為表裏。任何社會，都需要人才；適變求存，人才更是國家的命脈。在疾風暴雨的前夕，先覺先憂的魏源、龔自珍等，為曲突徙薪而奔走呼號，為補苴罅漏而爛額焦頭，而卻悲憤地發覺：清醒而溫熱的人心，是如此之少！有守而有為的人才，是如此之少！「萬馬齊瘖」[4]，這實在是時代的悲哀。考究病源，就因為傳統的政教學術上的短蔽、疾患，到了當時，都惡性地擴大和潰決。軀體既羸，外侮隨之，於是百多年的憂危與動亂，就此開啟。

1 《海國圖志．總敘》，光緒六年邵陽急當務齋新鐫百卷本，頁 1B-2B。

2 《聖武記．序》，台北：世界書局，1960 年六月再版本。

3 同注 1。

4 龔自珍〈己亥雜詩〉之一：「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見《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 521。

一、政治不良造成奴才

自先秦以來，我國各種主要的學術思想，對制衡君權，似乎都提不出一套實際有效、副作用不多的辦法。儒家稱慕聖君賢相，對權力中毒卻始終束手；墨家宗命鉅子、法家歸利明君，都以一夫的獨裁，為價值的準則。黃老虛靜之教，既不足以勸阻人主的自雄予智、芻狗蒼生；漢儒式的三統五行之說，更授野心家以惑世誣民之柄。沒有發展出民主民權，當初孟子的民貴民本之說，就由先驅變成落後了。連民貴之說也疾之如仇的明太祖，雄猜濫殺、廢相戮功；接武的明成祖，更廷杖大臣，寵縱近倖，卒之天道好還，以士大夫的無用無恥而亡其國家。滿清崛起建州，以封建八旗統軍議政。既得天下，化部族為國家，於是主奴之禮、跪叩之儀，施於廟堂之上，君主共天神比尊，臣僚與僕奴等下，習與性成，就形成了奴才政治。另一方面，滿清以一小撮統治大多數，滿漢之防、猜忌之念，不因時日而稍減，高壓懷柔，交替運用，威之以文字之獄，辱之以貳臣之傳，於是士人奪氣、黎庶寒心，罔上欺下、阿媚權勢的風習，就更固而難移了。嘉慶初，正直耿介的洪亮吉，已經在〈上軍機王大臣言事書〉中，勇敢而沉痛地指出：

> 人才至今日，銷磨殆盡矣！以模稜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取進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缽相承，牢結而不可解 …… 至於利弊之不講，又非一日。在內部院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顧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撫諸臣，其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國計民生，非所計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

保本任而已。慮久遠者，以為過憂；事興革者，以為生事。[5]

後來的魏源也說：

國家承明制、撝明弊，以內政歸六部，外政歸十七省總督、巡撫，而天子親覽萬幾，一切取裁於上，百執事拱手受成。上無權臣方鎮之擅命，下無刺史守令之專制，雖蒐瑣中材，皆得容身養拙於其間。漸摩既久，以推諉為明哲，以因襲為老成，以奉行虛文故事為得體。惡肩荷、惡更張、惡綜覈名實。若斯文襄之創中河、鄂文端之改土歸流，皆力戰群議，屢躓屢奮而後勝之；以怡賢親王之畿輔水利，猶不旋踵而泯蕩。故便文畏事、窶陋之臣，遇大利大害，則動色相戒，卻步徐視，而不肯身預。自仁廟末年，屢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優游成習，卒莫之反也。[6]

龔定盦在這方面，所論又比他的至友魏源，更為激切深刻，他說：

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強，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而胤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 …… 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殲、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暮乎！[7]

5 《清史稿．列傳》第 143〈洪亮吉傳〉，《清代史料彙編》影本，香港：益漢書樓，1977，頁 2986。

6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328。

7 〈古史鉤沉論一〉，《龔自珍全集》，頁 20。

論「古」，即以論今，實在一針見血。在少年英銳時所作的〈明良論〉中，他也說：

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至身為三公，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於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匪但目未覩，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非由他，由於無以作朝廷之氣故也 …… 士無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名之曰辱社稷 …… 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為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豈真敬畏哉？問以大臣應如是乎？則其可恥之言曰：我輩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務車馬、捷給者，不甚讀書，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賢矣，已勞矣。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為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里，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為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尟矣！[8]

甫踰弱冠的定盦，已經如此銳利地看透了官場，也預言了鴉片戰爭時祿蠹們的種種醜象。能「伏棟俱壓」的，已是難能可貴，還說什麼棟樑之材

8 〈明良論二〉，《龔自珍全集》，頁 31-32。

呢！廊廟之臣，往往是庸鄙腐朽——最典型的是曹振鏞：從嘉慶十八年（1813）到道光十五年（1835）去世，連續做了廿三年的大學士，高踞宰輔之位，極得清帝寵信和尊重。朱克敬《瞑庵雜識》卷二記：

> 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問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道光以來，世風柔靡，實由於此。近更加以滑浮，稍質直，即不容矣。有無名氏賦〈一翦梅〉云：「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又云：「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瞶曚。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又云：「八方無事年歲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隆。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又云：「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便無窮。不諡文忠，便諡文恭。」[9]

而這樣的庸鄙鄉願之臣，竟諡為當代最榮譽的「文正」！——「正」的標準，竟是如此，一時風氣，也可想而知了。《清史稿．列傳》第一五〇〈曹振鏞傳〉說：

> 歷事三朝，凡為學政者三、典鄉會試者各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華之士。殿廷御試，必預校閱，嚴於疵累忌諱，遂成風氣。

這樣的人，握朝綱、掌文衡，不知多少英才特達之士，因此一躓再躓，

9 參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卷四、第五章，台北：世界書局，1966，頁 259-260 引。

老死於巖野下僚之間！魏源悲憤地指斥：

> 國家有一讜議，則必有數庸議以持之；有一偉略，則必有數庸略以格之，故聖人惡似是而非之人，國家忌似是而非之論——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成理，上傅會乎經義，使人主中其腊毒而不自知，君子所深惡也……論卑而易行，苟安而不犯難，其迹何嘗不近忠厚長者？其稱引比附，何嘗不託於六藝？夫孰知其誤人家國，壹至此哉！[10]

又指出：

> 歷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強藩、女主、外戚、宦寺、權奸、鄙夫也。暴君無論矣；強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皆必乘亂世闇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則不然，雖當全盛之世，有願治之君，而鄙夫胸中，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才為何物。所陳諸上者，無非膚瑣不急之談、粉飾潤色之事；以宴安酖毒為培元氣，以養癰貽患為守舊章，以緘默固寵為保明哲：人主被其薰陶漸摩，亦潛化於痿痺不仁而莫之覺。豈知久之又久，無職不曠，無事不蠹，其害且在強藩、女禍、外戚、宦寺、權奸之上！其人方託老成文學，光輔升平，攻之無可攻，刺之無可刺，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已不與其責焉。古之庸醫殺人，今之庸醫，不能生人亦不敢殺人，不問寒、熱、虛、實、內傷、外感，概予溫補和解之劑，致人於不生

10〈默觚下．治篇六〉，《魏源集》，頁 51。

不死之間，而病日深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猶鄉願之害德也。聖人不惡小人而惡鄙夫鄉願，豈不深哉！[11]

當時的中國，大大小小的曹振鏞，幾乎滔滔者天下皆是，魏源的慨歎，不是有見而云、有感而發嗎？

二、教育不良造成庸才

曹振鏞之類的大小奴才，必然同時是庸才，而庸才卻不一定同時甘為奴才，只不過誤國的程度，卻也相去不遠。

庸才的形成，主要是不良的教育制度。自晚周學術流入民間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出路，乃是由學入政。仕宦之外，農工百業，貶作下乘；貨殖經商，譏為市儈。士大夫自居清貴，虛驕傲岸，對社會民生，其實往往並無真正造福，反而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成了社會的耗蠹與負擔。清代名士鄭燮在家書中的名言，實在代表知識份子的自律與自責。另一方面，知識份子即使不忘淑世，但所養非所用，也常是嚴重問題。分科舉士之制，起於隋唐，矯魏晉六朝門弟之弊，公開仕途，用意本來很好。到明清兩代，以八股制藝、小楷詩賦，掄才取士；尊其體為「代聖人立言」，不得用秦漢以後的文章與事例——魏源、龔自珍兩位並世而出的奇才，都因為書法或者文章事例問題，屢試屢躓，不得直接施展政治抱負。魏源說得好：

11〈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頁 66-67。

天地之生才也，「予之齒者去其角，兩其足者傅之翼」，是以造化無全功，陰陽無全能。以虞廷五臣，皆聖人之材，而明刑、教稼、治水、典胄，終身不易其官。吾知孔子用世，必不使游、夏司繁劇、而由、求典文章，必不使曾冉專對使命，而宰贛師保坐論。天地有所不能強，而況於人乎？後世之養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試之也，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則又一人而徧責六官之職，或一歲而徧歷四方民夷之風俗；舉孔門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攝者，而望之科舉兔冊之人。始也桃李望其松柏，繼也綵勝望其桃李；及事不治，則拊髀而歎天下之無才——烏乎！天下果真無才哉？《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所用必所養、所養必所用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也。[12]

他又吟唱：

小楷書，八韻詩，青紫拾芥驚童兒；書小楷，詩八韻，將相文武此中進。八扇天門訣蕩開，玉皇親手策群才，臚唱喧傳雲五色，董毫花樣毛錐來。從此掌絲綸，從此馳鞚鐸。官不翰林不謚文，官不翰林不入閣。從此考樞密、從此列諫官，盡憑鉄管繡鴛鸞。借問樞密職何事？佐上運籌議國計；借問諫臣職何秉？上規主缺下民隱。雕蟲竟可屠龍共，誰道所養非所用！屠龍技竟雕蟲仿，誰道所用非所養！君不見，前朝待詔翰林院，書畫琴棋藝原賤，工執藝事

12〈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頁 37。

可進諫，差勝手搏可方面，差勝琵琶可封王，鬥雞可乘傳。銓部竹簽且得材，潤色承平況文絢。昨日大河決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詩；昨日樓船防海口，推轂先推寫檄手！[13]

又說：

數開科、數開捐，開科遴材為得士，開捐輸粟為助邊。借問開科得何士？項槁鹽車悲騄駬；宋代得一張齊賢，一榜賜第方能爾。借問開捐何所潤？中外度支財益罄。漕鹽河兵四大計，漏卮孰塞源孰盛。開科開捐兩無益，何不大開直言之科籌國計，再開邊材之科練邊事？市骨招駿人才出，縱不拔十得五終得一！[14]

他唱歎的，並非只是自己的得失，也更是生民的休戚、國運的窮通。因為，這種考試掄才制度，以古人陳迹，桎梏思想；以文字末藝，銷耗聰明；顧亭林說八股之害，甚於坑焚，實在並非虛語。智慧和運氣好的，雖明知時文的鄙陋無用，為了進身，不得不視為敲門磚；中材以下、或者際遇惡劣的，就往往生葬功名窟中，不能自拔了。由這種「教育」出來的，不特經濟民生，從無所曉，即書本學問，自《四書》而外，亦往往淺陋可哂。「問太傅之為誰，辨孟堅之非固；我將愧而入地，彼猶懵然坐雲」；[15] 夜半無人，一燈如豆；引吭長鳴，悲聲四壁。或語以漢祖唐宗，不知何代人，叩以四史十三經，不知何等物，這相信並非罕見的怪

13〈都中吟〉十三首之一，《魏源集》，頁 675-676。

14〈都中吟〉十三首之三，《魏源集》，頁 676。

15 彭湘涵：〈答李洪九進士書〉。

象，再參以《儒林外史》等所描繪的祿蠹群相，都可以見到他們的面目是怎樣可驚可哂。這輩士子，一旦登仕授官，民情風習，既不甚通曉；時政利弊，更非素習，惟有委諸胥吏幕僚；此輩之中的不良份子，於是得以把持操縱、中飽漁利——如果為官者本身也是這類材料，就更烏天暗地，民怨叢積了。事實上，大多數十年窗下，辛苦得官的，為了佩紫懷黃、玉顏金屋，心力所繫，往往專在周旋肆應，以貪污聚斂富家，以趨附逢迎榮身，勤於「做官」而惰於做事，巧於為文而拙於為政；及至宦海沉浮，幸登高位，已經心力衰疲，只能賈其餘勇以固寵保位，一切都因循苟且，變成魏源所痛斥的老猾鄉願了。[16] 龔自珍說：

今之士進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計之，以三十為斷，翰林至榮之選也；然自庶吉士至尚書，大抵須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學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學士。而凡滿洲、漢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極速亦三十年。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此今日用人論資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進身，以至於為宰輔，為一品大臣，其齒髮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憊矣；雖有耆壽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進，然而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蒽、因退蒽而尸玩；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傑然終日，不肯自請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盡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此辦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原也。城東諺曰：「新官忙碌石駿子，舊官快活石獅子」，蓋言夫資格未深之人，雖勤苦甚至，豈能冀甄拔？而具形相、向坐者數百年，莫如柱外石獅子，論資當最高也。如是而欲勇

16 參看注 11。

> 往者知勸，玩戀者知懲，中材絕僥倖之心，智勇甦束縛之怨，豈不難矣！至於建大獻、白大事，則宜乎更絕無人也。[17]

這實在是當代官場，奄然無生氣的解釋與寫照了。

八股取士的副產品，是胥吏政治，已如前述。魏源之世，因為時勢衰變，少數幹濟有為的能吏，固然廣攬人才，共赴時艱；那些有心無力，或者不得不維持局面的一般大吏，也較為積極地延聘參謀，讓「才而不第」者，作「第而不才」者的輔佐。遊士幕客之風，由此漸啟。未第時的魏源，和包世臣、周濟、王鳳生等，都博識多能，為地方大吏爭相延議，以解決河、漕、鹽、兵等大政的難題，後來湘軍的曾左胡彭以至李鴻章等，就都以幕僚之佐，成就大業了。

三、貪黷風氣敗壞政治與經濟

能官良吏，以及魏源、包世臣式的幕僚，畢竟難能可貴。充斥滿清官場的，是庸鄙鄉願的大臣，和狡猾奸貪的胥吏。他們蠹國剝民，憑藉的主要是過時的繁複的條文律例。一切河漕鹽政，利之所在，無不爭血聚蠅、百孔千瘡。魏源說：

> 東南大計，無如漕鹽，二百載來，文法委曲煩重，致利不歸下、不歸上，而盡歸中飽，官民交困。間有講求刷剔，芟薙更革者，則中飽蠹蝕之人，轟起而交持之。[18]

又說：

> 休養日久，生齒熾而機變滋，人心日趨於利，利出於二孔，則不歸於上，不歸於民。有拯時君子欲撟其弊而還其利，勢必不得不出於更革。小更革則小效，大更革則大效，於是中飽不便之人，輒群起而譁之。豁群譁之難，難於豁積弊，任事者遂動色相戒，以改作為多事，以因仍為持重。[19]

他詠歎說：

> 吏兵例、戶工例、繭絲牛毛工會計，全恃舞文刀筆吏。河漕奏銷尤鉅利，一準一駁百萬費。缺可補，可不補；級可去、可不去；翻手覆手敢予侮，能令公喜公怒。何況捐房與庫吏、寶玉大弓頻睥睨。府史胥徒非世業，誰道盡握六官法？若言部胥不可捐，何故刑部胥無權？任法任人孰操券？請看汲黯張湯傳。[20]

同時名儒潘德輿，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天下大病不外三字——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任吏挾例以牟利，

17〈明良論三〉，《龔自珍全集》，頁 33-34。

18 同注 6。

19〈御書印心石屋詩文錄敘〉，《魏源集》，頁 243。

20〈都中吟〉十三首之二，《魏源集》，頁 676。

而天下大亂。」[21]—— 就是這三位一體的吏、例、利，蠹空了天朝大國，連魚米之鄉的江南，也瀕於農村破產！龔自珍慨歎說：

>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勝栽禾？[22]

這樣，貪黷之風，就動搖了國家的經濟根本。

「國家之敝，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左傳桓二年，昭五年，十三年），貪污是吏治腐敗的根源，而清代的薄俸陋規，又是促成貪污的因素。

清代官俸極薄。據《大清會典事例》所載：正一品歲支銀一百八十兩，從九品卅一兩。京官有恩俸、俸米和額外津貼或辦公費用。每一官吏，依附為生者常百數十人；應酬逢迎，所費更是不貲。如果是地方官吏，即以知縣為例，方橫百里之內，二三十萬民眾之地，一切賦稅獄訟、簿書文移、差驛倉庫，責於一身，必須數十名以上的幕僚，處理刑名錢穀；一百數十名以上的差役，協助什務，此外又必須應酬地方紳士，以安撫教養。層層剝削，在在需財，都必需由知縣自籌收入。於是，謀求非分收入，早已上下成風，變為公開的秘密了。

外官的陋規，本以繳稅時附徵的「火耗」為主，雍正時，火耗歸公，將它合法化，局面稍告澄清，但正俸收入，仍難養廉；加上人口日多，物價日貴，逢迎奢貴，又久成風尚，於是上下官吏，都巧立名目，收取種種利益。舉州縣毫毛小事，莫不有費。「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實在是有血有淚的譏謔。特別是漕米。政府每年徵收江南漕米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難怪有心人要慨歎：「其為痛哭，可勝道耶」[23]了。鹽政陋規，也不在漕運之下，尤以兩淮為甚，鹽官鹽商，朋比為奸，享用豪奢，勝於王室[24]；這批國家的蠹蟲，一切開支和利潤，都轉嫁到沒有「辦法」的平民身上。海關、學差，也有類似的弊竇。包世臣說：「今者民無殷窶，莫安其生；吏無大小，各憂其貧」[25]；而吏總比民有辦法，因「例」以求「利」，就成了為「吏」者的最大任務了。洪亮吉說：

> 往吾未成童，傳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為守令者，親友慰勉之，必代為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為守令者，親友慰勉之，必先為之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已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不復掛之齒頰已！於是為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媵保，於得缺之時，又各揣乎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之贏餘若何！不幸

21 《清史稿．列傳》272，《文苑》三，《清代史料彙編》本，香港：益漢書樓，1977，頁 3625。又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易吏胥議》有言：「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於奴隸矣；後世權勢又莫貴於吏，至今日而駕於公卿矣！ …… 近日江蘇縣漕書，闇人更迭為之，衣冠不與齒，其賤也如彼 …… 州縣曰可，吏 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 …… 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於是乎其權遂出於宰相大臣之上，其貴也又如此。夫所謂可不可者，部費之到不到也 …… 顧氏炎武謂之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是也。」（1967 年台學海影光緒丁酉 1897 本，總頁 38-39）又〈省則例議〉亦有「談者謂『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於乎！盡之矣」之語，見同上書，頁 42。

22 〈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頁 521。

23 陸世儀：〈漕兌揭〉，《皇朝經世文編》卷 46；台北：世界書局，1964，頁 3B。

24 以上參看王栻：〈薄俸與陋規〉，《文史雜誌》第三卷第一、二期合訂本，香港：龍門書局重版，1967，頁 53-72。

25 〈說儲上篇前序〉，《清儒學案》卷 136，《安吳學案》，台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委會，1967，頁 16B；又參看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厚養廉議》，同注 21 本，頁 27。

而守令屢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亦大困矣！[26]

「千里為官只為財」，結果自然往往造成「一路哭」了。龔自珍則從另一角度，剖析因俸薄而憂貧、因憂貧而貪黷的底蘊。他說：

今士大夫，無論希風古哲，志所不屬；雖下劣如矜翰墨、召觴詠，我知其必不暇為也。今上都通顯之聚，未嘗道政事、談文藝也；外吏之宴游，未嘗各陳設施、談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贏不足若何？車馬敝而責券至，朋然以為憂，居平以貧故，失卿大夫體，甚者流為市井之行……夫士辭鄉里，以科名通籍於朝，人情皆願娛樂其親，贍其室家；廩告無粟、廡告無芻、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家人嗷嗷然呼，當是時，猶有如賈誼所言「國忘家、公忘私」者，則非特立獨行以忠誠之士不能。能以概責之六曹、三院、百有司否也？內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為，以負聖天子之知遇，抑豈無心，或者貧累之也。[27]

就是這樣，政府以薄俸陋規，驅使貪污，賣官鬻爵，培植貪污；社會風氣，又以奢侈奔競，誘導貪污；全屋玉顏，教育貪污；於是千萬虎狼，縱於天下，吏治又怎能不壞、民怨又怎能不深呢！

其實，貪黷之風，也並不完全由於莠民劣吏；清廷自己，已經是最

26《卷施閣甲集》卷一，〈守令〉；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卷四，第五章，台北：世界書局，1966，頁 258-259。

27〈明良論一〉，《龔自珍全集》，頁 30。

大的聚斂者。清初諸帝，都喜治宮室：熱河有避暑山莊；圓明園的建設，費了四朝的經營。乾隆寵幸和珅，當國二十餘年，搜括了驚人的財富，而乾隆自己，在位極久，好大喜功，功號十全，江南屢幸，康雍幾十年的國庫積聚，被他揮霍一空。再加上難可根治、尤其非清代吏治所能清治的黃河，歲歲為患，成了國庫一大漏巵。又有令人頭痛的八旗生計問題，都是難解的財政死結。政府財用既困，於是賣官鬻爵；以捐納得官者，更心安理得地剝削侵漁，於是又加重百姓的艱難和怨憤。這樣惡性循環，就動搖了清朝的國本。龔自珍警告說：

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為患。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臀以肥腦，自啖自肉，無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蹙；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餐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28]

在舉世昏昏醉夢、沉酣升平的當時，這可說是先知先覺的吶喊了。

28〈西域置行省議〉，《龔自珍全集》，頁 106。

四、耕地不足與利權外溢

清代中葉日趨嚴重的經濟危機，其實也不能完全歸咎於不良的政治。傳統中國，在生產技術不變的條件下，耕地與人口比率的變動，常常是治亂循環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自古以農立邦，有土有財，人口藉土地給養，土地藉人力開發，可耕地與可用人力的比例，常為治亂安危所繫。大亂之後，人口劇減，墾荒闢地，樂業安居，加上開國或中興君臣，較能體恤民間疾苦，勤於求治，所以每有小康之局。及後生齒日繁，可墾之地日減，而水利興修，土壤改良，都墨守成規，沒有改善，又無深耕輪種之法，以休養地力，於是收穫日減，生計日蹙。另一方面，自漢以來，工商業發展規模不大，財富的再投資，主要仍在土地；而生計日窘，迫使小自耕農變賣田產，變為佃農，於是土地便集中少數不生產分子手中，貧富日趨懸殊，就成為社會動亂的基因了。樂歲豐年，政府安撫調和得法，尚可苟安，一旦水旱蝗蟲為災，又或政府聚斂過甚，不甘困死溝壑者就鋌而走險，釀成民變，積小亂成大亂，最後又覆亡了一個王朝。龔自珍在著名的〈平均篇〉中指出：

> 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易。王者欲自為計，盍為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燹、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29]

正如他所謂，「京師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30] 魏源〈崑山別龔定庵〉詩說：

> 人神孰波濤？天地誰鐘鼓？天昌二鳥鳴，同謫胥江浦，使為世所譁，又為饑所附……半生湖海氣，百年漂泊旅，誓回屠龍技，甘作亡羊補！……[31]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龔、魏二子，已經預感到由歷史老問題而開展的歷史新變局，已經迫在眉睫，因此奔走呼號，要作晨鐘之警、補牢之計了。

據《清史稿．食貨志》和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頁 364），由清初到道光，耕地和人口的數字比較如下：

	西元	耕地（頃）	人口（人）
順治二年	1645	4,033,925	
順治十八年	1664		19,203,233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6,078,430	
康熙五十年	1711		24,621,324
雍正二年	1724	6,837,914	
雍正十二年	1734		26,417,932
乾隆十八年	1753	7,081,142	
乾隆六十年	1795		296,960,545
嘉慶十七年	1812	7,915,251	
嘉慶二十四年	1819		301,260,545

29〈平均篇〉，《龔自珍全集》，頁 78。
30〈尊隱〉，《龔自珍全集》，頁 88。
31《魏源集》，頁 600。

（接上表）

	西元	耕地（頃）	人口（人）
道光十三年	1833	7,375,129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412,986,649

近二百年間，耕地增加不及一倍，人口增加差不多二十倍！即使康雍之時，丁口田畝分別納稅，民多隱報；國初又以戰亂之故，戶籍不完，但人口劇增，遠超耕地的拓擴，卻是事實。農村經濟，於是瀕於崩潰了。

耕地不足之外，嘉道以來，又多了一項因鴉片走私、洋貨充斥而致的白銀外流問題，動搖了國家幣財政基礎，危害了國民經濟。中國向為農村自足經濟，無正規而發達的國際貿易。十八世紀後期以來，歐洲國家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特別是英國，因為盛產當時最先進的能源——煤礦，開發最早，國力擴張最快，後來居上地陵越西、葡、荷、法，一躍而為首號殖民帝國，以利炮堅船，掠奪土地、征服人民、網羅原料、傾銷商品，於是領土徧於全球，富強甲於世界，由蠶食印度、攻佔緬馬，而進窺中華。自 1783 年東印度公司取銷專利權以來，五十年間，對華輸入，提高六、七倍，但全面比對，仍有逆差；於是勾結中國沿海莠民貪吏，私運鴉片，作為牟利，於是中英貿易形勢，大告逆轉[32]，又當時貴官富戶，以至倡優小民，都喜用洋貨。陳作霖《炳燭里談》說：

> 道光年間，凡物之極貴重者，皆謂之洋：重樓曰洋樓、彩轎曰洋轎，衣有洋縐，帽有洋笐，掛燈名曰洋燈，火焗名為洋焗；細而至於醬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顏料之鮮明者，亦呼洋紅洋綠。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洋乎！洋乎！蓋洋洋乎！[33]

32 詳見《聖武記》卷十，《清史稿．食貨志》及本編第十章。

33 卷二，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卷四，第七章，頁 300。

而洋商交易，必以套取中國紋銀為計，於是作為金融基礎的白銀，大告外流，銀貴錢賤，引致主食品、日用品價格騰貴，而農村手工業製品受洋貨打擊，萎縮不振，如包世臣說：

> 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盛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34]

江南富庶之地，尚且如此，貧瘠之鄉可知。農村破產，自清初以來，屢伏屢起、藉宗教以結眾的民變，於是大為頻密了。

五、考證學的退潮

清初顧、黃諸大師，懲晚明空疏誤國之病，力倡讀史通經，以致用淑世。為治經史，本有訓詁考據的需要。亭林的《音學五書》、《日知錄》，已經是乾嘉先導。後來清廷屢興文獄，摧抑士氣，諱說本朝，學術的總方向，就由宋明的「尊德性」，一變而為「道問學」，這便是乾隆中葉以來，盛極一時的古文經學了。正如龔自珍說：

> 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為道問學。[35]

那時的學術風氣，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

34 《齊民四術》卷 26，見《安吳四種》，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94 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35 〈江子屏所著書序〉，《龔自珍全集》，頁 193。

使有遁」[36]，以「實證」代「空談」，所以名為「樸學」。尤其是惠棟、江藩一派，更以「尊崇漢儒、不廢古訓」[37]高自標榜。問題是：他們所尊崇的，不在漢儒的通經致用，而僅在東京的名物訓詁；他們所標榜的「樸實」，並非「實用」，而只是「實證」；而且所謂「實證」，也並非「實物」，更非「實象」，而只是文字證據。在故紙堆中，各執一辭，反複考究。有時確是聲音明則訓詁明，千古疑難，因之而破，給予後人很多讀書的方便；但更多是窮老盡氣，終生糾纏於文字羅網之中。初則以手段為目的，為學問而學問；繼則變目的為手段，為禽犢聲名而考據。這樣，就學問目的言，已經卑而不高；就方法言，也是偏而不全；就對象言，更不免號「樸」而實「華」[38]，與心性空論同病。辜鴻銘《幕府紀聞》說：

> 名儒大家，負泰山重名者，日夜穿鑿經史，講究謬異。金石說文二家，宋明以前之所無。顧亭林錢大昕諸家，以考證為學以來，務出新奇，務勝宋明。其為無用，百倍宋儒，此與晉時老莊，相距幾何？（卷下，頁 37）[39]

洪允祥《讀史隨筆》說：

> 滿清以武力屠殺漢族，旋又愚以利祿榮辱。今日所謂清代之名臣者，皆當時皇帝之弄臣也；今日所謂清代之名儒者，皆不得已而托於破碎瑣屑之考據訓詁，以自藏其身者也。故清人考據之學，其始與魏晉人之談老莊，同一用心；其後則盛名所在，人皆附之矣。（《國風》三卷十一期引）[40]

壁壘森嚴的蘇州惠學，唯漢是尊，「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固不著錄」[41]；其弊是「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42]安徽戴學，號稱「實事求是」，近人梁任公、胡適之亦以此頌揚戴氏備至；但當世群推東原者，不過以其聲韻訓詁，仍不免如惲敬所譏的「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43]夏炯更痛譏乾隆諸君學術，說：

> 乾隆以後，近百餘年來，講學之士，專為一節一句，一文一字，盈千累百，剌剌不休。不特絲毫不適於用，且破壞碎裂，轉為賊經。今就其稍著者論之：
>
> 穿鑿性理，故為艱深，勾股割圖，改宣城之面目；六書音韻，竊江氏之緒餘，是休寧戴氏之學也。
>
> 據此校彼，改異為同；明知無用之辨，好為小慧之行，是抱經盧氏之學也。
>
> 生今反古，以篆代真，說《堯典》不讓三萬言之繁，詮《禹貢》無一二端之得，是艮庭江氏之學也。
>
> 炫博矜奇，以多為富；讀史不鏡得失，僅詳「某本或作某」；《養

36〈陳碩甫所著書序〉，《龔自珍全集》，頁 195。

37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自序》，台北：廣文書局，1967。

38 陳澧說：「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非樸。」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三章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 606。

39 參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卷四第四章引，頁 251。

40 同上注。

41 江藩子江鈞，述父撰述之志。見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第三編，頁 598 引。

42《焦氏叢書》卷首，王引之手札語；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卷四第四章引，頁 249。

43〈三代因革論〉，見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頁 598 引。

新》萃為一錄，令人味之無可味，是嘉定錢氏之學也。

妄誕已邀寬典，著述仍竊虛名，漢魏之音，掇拾前人所唾棄；傳誌諸外，不明體要而立言，是稱存洪氏之學也。

《考工》何補匠氏？辨穀正算老農；稟資既愚，不能貫通經注；傳會不合，因而轉駁鄭君，是新安程氏之學也。

割裂本經之句讀，變易傳注之原解，《廣雅》一字，疏至千言；語助之詞，彙成巨帙，是高郵王氏一門之學也。

自知淺陋，依傍他人；著書亦覺其多多，鳴蟲終誚其唧唧，是金壇段氏之學也。

此數人者，皆近百年來多稍顯著之人；試取其書平心而察之，徒覺其蕪鄙瑣碎，坐井觀天而已！[44]

夏氏用《荀子・非十二子篇》的語調，徧譏乾嘉考據名宿，所論雖不免苛刻周內，但「蕪鄙瑣碎、坐井觀天」，確是道着病處。

戴段錢王以後，樸學英華漸竭，附庸漢幟者，更不免細碎襞積，凌廷堪說：

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即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即以毛鄭為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賾偽《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為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45]

44 參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卷四第四章引，頁 250。

又說：

搜斷碑半通，剌佚書數簡，為之考同異、校偏旁，而語以古今成敗，若坐雰霚之中，此風會之所趨而學者之所蔽也。[46]

他又詠歎：

六書廢已久，訓詁多闕殘，一二篤信儒，闡發誠艱難。殷殷考訂時，亦擇心所安。纖兒擇唾餘，群籍束不觀，但取許氏書，閉戶施鉛丹。《六經》所有字，無不遭譏彈。《說文》未載者，毅然信筆刪；用力既不多，已足驚愚頑。尋彼沽譽念，真見其肺肝！宋儒論錯簡，厥咎當可寬；似此僭妄罪，何止如邱山！豈其許叔重，遂掩周孔還？[47]

後來陳澧也感慨說：

《漢書・藝文志》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缺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

45〈與胡敬仲書〉，《文集》卷廿三，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章，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 503。

46〈大梁與牛次原書〉，《文集》卷廿三，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章，頁 505。

47〈學古〉詩之一，《校禮堂詩集》卷五；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章，頁 508。

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此一段竟似近代經學言之，句句字字，說着近儒之病。[48]

他又用邏輯學上的兩難論法，批評樸學家得筌忘魚、抱小失大的弊病：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為也？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注疏文義，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讀之乎？何以文義已明者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而讀之乎？願經師有以教我也！[49]

又說：

解經而不讀經者，其必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之人讀之而無疑可也」；然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而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50]

所以，他總結當代考據學的各種弊病，說：

今時學術之弊：說經不求義理，而不知經；好求新義，與先儒異、且與近儒異；著書太繁，誇多鬥靡；墨守；好詆宋儒、不讀宋儒書；說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鑿牽強；不讀史；以駢體加於古文之上；無詩人；門戶之見太深；輯古書太零碎。[51]

清末的朱一新說得好：

徒沾沾名物器數，繁稱博引，震炫一世，而治術學術之廣大精微者，轉習焉不察。國事人心，亦復何補？[52]

當然，為考儒家辯護者，可以委曲解釋，他們避觸時忌，借此自藏；國事人心，不敢聞問；不過，正由於他們太「為學問而學問」了，國事人心，就弄成後來的樣子！如果說：這不當苛責讀書人，要責怪統治者；那樣，讀書人又憑什麼高踞四民之首，受社會的優惠與供養呢？一旦時世既移，風尚改變，無味無用的樸學，就被有識之士所深深鄙厭了。

六、義理學的復興

考據的初興，本為讀經，經書的價值，本在義理；這在乾嘉全盛時期，若干考據大師，對此也並非缺乏認識。戴震臨終說：「生平所說，茫如隔世，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又說：「學有心得者，公諸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也」，不似一向所著的考訂之書，強半為人竊取。」[53] 他又會說：

48 同上注，頁 604。
49 同上注，頁 602。
50 同上注，頁 603。
51 同上注，頁 607。
52《佩弦齋雜存．弟懷新跋》引其語，見同上注，頁 629。
53 詳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局，1976，頁 118-119。

> 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

而「乘輿之大人」，自然是義理。[54] 後來龔自珍〈六經正名〉也指出《爾雅》之類，只是「經之輿」，不能與《詩》、《書》同列[55]，可說是東原的繼響。定菴的外祖、東原的弟子、段玉裁，對老師「此學不僅在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56] 的看法是贊同和辯護的。他序《戴東原集》，發揮師說：

> 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57]

段氏晚年，又說自己「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他指出「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58] 但與戴震同輩的錢大昕、朱筠等，卻以為《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之類，可以無作——並不因為戴震務與程朱立異的動機，而是

54 同上，頁 103。

55《龔自珍全集》，頁 38。

56〈古經解鉤沉序〉，《戴震文集》卷十，台北：華正書局，1974，頁 146。

57 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頁 114-115 引。

58〈朱子小學跋〉，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67。

根本地輕蔑義理之學，謂是「空說義理，可以無作」。[59] 其實，正如方東樹說：

> 漢學諸人，其蔽在立意蔑義理。[60]

段玉裁也說：

> 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壞，政事腐，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故也。故專言漢學而不講守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而況所謂漢學者，如同畫餅乎！[61]

「如同畫餅」，真是對當世「樸學」最深切的諷刺！江藩《漢學師承記自序》譏彈「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其實，心性天命，正才是禮樂之源；如果心無所主，又怎有禮樂？怎用禮樂呢？某些漢學家的大病就是不知道、不求道、而偏要毀道！我們似乎不能單因為他們少時應考，受朱注壓迫過甚，長大後便以反朱為能事，這一點心理上的解釋，便諒解他們對義理學的輕忽與誣蔑。惠棟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62]；汪中聞宋儒之名即罵——其子則說罵宋儒者是凌廷堪[63]；章學誠也痛惜戴震筆之於書，精深謹嚴，而口頭譏侮董韓醜詈程朱，則肆

59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卷三：〈朱陸篇後〉，又〈答邵二雲書〉，皆有詳細論述；參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33-34、384-385；及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頁 5-7。

60《漢學商兌》，浙江書局刊本，1900，卷中之下，頁 48B-49A，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頁 115 引。

61〈與陳恭甫書〉，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66 引。

62 同上書，引李集敬堂《鶴徵錄》，頁 321。

63 同上書，引凌廷堪〈汪容甫墓誌銘〉及汪孟慈〈孤兒篇〉，頁 506。

無忌憚。[64] 這種風氣的始作俑者，可說是據四庫總纂要津的紀昀。魏源說：

>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憾。」是說也，於茲錄發之、於《元城語錄》發之、於《盡言集》發之，又於杜大珪《名臣碑琰錄》發之，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闢，汔再汔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 …… 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且朱子於劉公也，推其剛則視陳忠肅為得中，劾伊川非私心，述折抑必非妄語。養氣剛大，殄致風雷，皜然秋霸烈日相高焉，而謂其「百計抑之，終不能磨滅」；然耶？否耶？ …… 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瞽說，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為奇貨 …… 夫忠定與文公皆百世師，原非後人所能一畚增嶽、一蠡損渤；而文達方以記醜言辯尸重名，余恐耳食者流，或眩其信仰前哲之心而靡從之，則是益重文達過也。[65]

其實，講宋學而不踐履，不免為偽君子；講考據而不尊義理，卻可以成真小人。紀昀之前，毛奇齡之無行，閻若璩之熱中，都不免為人齒冷。戴東原一時泰岱，也涉嫌秘珍本以自重、攘他人之心血。[66]《嘯亭續錄》

64《文史通義．朱陸篇》。

65《魏源集》，頁 217-218。

66 詳見魏源〈書趙校水經注後〉及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531-532。魏文見《魏源集》，頁 224-225。

卷三載：

> 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入室，必揚手作摟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摟入己懷也」。及仕宦後，秦諺楚，多所乾沒。人問之曰：「先生學問富有，而乃貪吝不已，得無畏後世之名節乎？」公曰：「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67]

阮元修《皇清經解》，「不取宋學家一字，世遂輕宋學如土苴。…… 於是人心風俗，日即於苟，而亂禍肇矣！」勞乃宣的話，實在並不是過甚其辭。[68] 道光時，古文家王拯（原名錫振，字定甫）《池司業廟碑》說：

> 東南群彥，起於顧炎武閻百詩諸子，務為實事求是之學，推崇兩漢鄭許諸賢，必以考證訓故為宗，明經學、講世務，所以懲夫末學浮游空虛之習者是也。觀於群經所捋正若闢易圖、尊詩序、證偽古文尚書，於爾雅說文天文算數，天下方輿圖說，古今制度因革損益，靡弗講明而切究焉。美矣！備矣！顧於先聖大儒誠意正心修齊之道，則固概乎未有所聞。操其末而遺其本，舉其粗而棄其精，不知矯枉過其直也。而其流放，遂至繁冗瑣屑，支離附會，若毛奇齡、戴震之徒，專欲以其覩記之雄，爭長天下，傲睨群倫，標舉漢學以為宗主。天下學者靡然從風，單詞隻義，一得自矜；其於天下事物，至微至紛，理之所不可通，而事之所不必詳者，不知何所補益，而必為之勞精敝神、探奇索隱！其間一二巨子，出其氣力以相推激，崇尚謬悠，漸又至於喜縱惡拘，黨同伐異；學日益離，而

67 參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頁 251 引。

68 引《桐鄉勞先生遺稿》卷一，〈論為學標準〉，同上書，頁 245。

心日益放。以其辯言周內，必使宋明致精守約諸賢，真有得於聖賢身心性命之學者，淺之不得為學、陋之並不得以為人……至使好學之士，猶津津然殫精畢力，轉相仿效，舉凡聖賢傳道經世之書，悉不問其大經大法義理所歸，而惟支詞旁解是尚，蓋士學之離蕩若此，天下之人才，惡得而不衰耶！（章士釗《柳文指要》，頁 511-512 引述）

這實在是深中肯綮的話。

魏源的同門、吳江（震澤）張海珊[69]也說：

談經訓者，專攻宋人，浸淫至今日，而其禍烈。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鄙理學為空言，斥廉恥為小節，嗜貨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為利祿之途然者，豈不信歟！[70]

漢學家中，能如王念孫的劾和珅、洪亮吉的諫嘉慶（分見《清史稿》列傳 143、268），實在是鳳毛麟角了！姚瑩說：

自四庫館開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禮義廉恥為何事。至於外夷交侵，輒皆望風而靡；無恥之徒，爭以悅媚夷人為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豈非毀訕宋儒之過！[71]

69 魏源有〈張鐵甫墓誌銘〉，見《魏源集》，頁 342-343；又見本編第十二章。

70〈小安樂窩文集．記收書日錄後〉，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567。

是的，宋學的興起，本來就為了中唐以至五代以來，夷狄交侵之故。這時世運既遷，大變方來，樸學家排擊義理，適以自暴其短，所以「道咸以下，漢宋兼採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72]，可見是「人心思宋」了——其實更不如仍然說：「人心思漢」：真正的、全面的漢學：每逢社會變亂，兩漢，尤其是西京，政教學術的恢閎隆盛，就格外令人而慕了。後來委曲為樸學申辯的章太炎，也不敢再稱之為「漢學」。他說：

大氏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徵其通雅。何者？傳記通論，濶遠難用；固不周於治亂，建議而不讎，夸誣何益？鬾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神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道，夷六藝於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為律，則上世人事汙隆之迹，猶大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流變；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73]

問題是：「夷六藝非古史」，不再適合時勢的要求，也不能厭足有志之士的希望。龔自珍移書江藩，指出他《漢學師承記》所用「漢學」一詞的不周延之處，「漢學」這名目，有十項「不安」，特別是：瑣碎飣餖，不

71《復黃又園書》，見楚金《道光學術》引李慈銘《越縵堂癸亥日記》；《中和月刊》第二卷；收於《近代學術史論文集》甲集，香港：崇文書店。

72《檢論》卷四，〈清儒〉，《章氏叢書》，浙江圖書館，1919，台北：世界書局影本，頁 26。

73 同上注。

可謂非學，但不得為「漢學」；宋人亦講名物訓詁；而且，「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為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得稱此為漢學以誣漢人。而且，「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泳白文，創獲於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方且為門戶之見者所擯。」[74] 這些「絕特之士」，可以以魏、龔二子為代表；他們的治經途與精神，就是「涵泳白文，創獲於經」，不為傳注所拘。魏源序莊存與遺書，說莊氏的經學：

> 萃乎董膠西之對天人，醇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劉中壘之陳今古，未嘗凌雜鈲析，如韓、董、班、徐數子所譏，故世之語漢學者，鮮稱道之，嗚呼！君所為真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於世之漢學者，庶其在是！[75]

他指出：微言大義、救世淑世的經術，才是值得崇尚的真漢學。——而且，真正值得崇尚的，也不只真漢學；真正的宋學，也值得講求；所以他終身服膺姚學瑛、一位以踐履證道、以「知本」為大學鵠的的宋學家。同時唐鑑又以學問風節，講理學於京師，倭仁、曾國藩等均從遊問學，於是兼講事功的理學，就又告興盛一時了。

74〈與江子屏牋〉，《龔自珍全集》，頁 346-347。

75《魏源集》，頁 237-238。

七、今文經學的復興

清初的經學，反明季的心學；乾嘉的經學，反兩宋的程朱。經學理學長期對峙，結果發展出道光的新理學和今文經學。重大義、講治功，是他們的共同點，也是道光學術的特點。

今文經學的精神，是擺脫東漢以來的傳注，直究白文，「不求甚解」，不拘拘於章句文字，也不拘限於一經一傳，直接體會群經的義理，甚至再探源頭，從兩漢上溯三代，探究經典的原始製作精神。——從乾隆中葉莊存與的《春秋》學，到嘉道間劉逢祿的《公羊》學，到龔自珍的以《公羊》義譏切時政，魏源的《詩、書古微》，抑東漢以揚西京，復興「古」學的「微」言大義——所以以「古微」名——，又活用「《三百篇》當諫書」的精神於〈默觚〉以論政論學；又擴大《尚書》之學，以纂述元、清的誓、命、征、範、典、謨、訓、誥，和西北以至世界的輿圖史地。到清末，康有為更大倡先秦諸子託古改制之說，他本身也自我作古，託孔子《禮運》之古，述《大同書》以改制，企圖窮則返本，從源頭上再開展中國文化。一步一步，真如魏源所說：

> 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76]

他所說的「復古」，其實是更新：在傳統的中國，這個技巧的運用，並非首次，因為自來中土文明，遠高於四裔；不滿於「今」的，惟有取法

76〈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敘〉，《魏源集》，頁 152；〈劉禮部遺書序〉，《魏源集》，頁 242。